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

第八輯



传记丛书

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

第八輯

《文献》杂志编辑部 编  
《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

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记丛书）

第 8 辑

《文献》杂志编辑部 编  
《图书馆学研究》编辑部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长春市印刷厂排版

河北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8 32开 2 印张 278 千字

198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6,900册

统一书号：11201·5·8 定价：2.15元

# 目 录

王运熙自传.....	( 1 )
附 主要论著目录 .....	( 10 )
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好榜样王寅生.....	秦柳方 ( 12 )
附 部分著作目录 .....	( 22 )
王驾吾先生传略.....	水渭松 ( 24 )
附 著作目录 .....	( 33 )
光荣的教育事业.....	毛礼锐 ( 34 )
附 主要著作目录 .....	( 51 )
冯和法传略.....	南 山 ( 53 )
附 主要著作目录 .....	( 68 )
江应梁自传及著作简述.....	( 69 )
吴文藻自传.....	( 77 )
吴世昌传略.....	施议对 ( 95 )
附 现存著作目录 .....	( 118 )
李化方传略.....	赵吉惠 ( 126 )
附 主要著作目录 .....	( 136 )
杨树达传略.....	白吉庵 ( 137 )
附 著作目录 .....	( 154 )
杨端六传略.....	肖致治 聂文明 ( 158 )
附 著作目录.....	( 170 )
庞石帚先生小传.....	屈守元 ( 175 )
附 著作目录.....	( 180 )

林举岱传略	谢素蓉 林 洋	(181)
附 著作与论文目录		(192)
林非自传		(195)
附 著作目录		(205)
我的自传	林焕平	(206)
附 译著目录		(220)
罗炳之自传		(222)
附 主要著作目录		(233)
罗根泽先生传	周勋初	(235)
郑振铎传略	陈福康	(265)
附 著译目录		(281)
洪谦自传		(284)
附 主要著作目录		(286)
容肇祖自传		(288)
附 主要著作目录		(302)
经济学家秦柳方	王易今	(306)
附 部分经济论著目录		(322)
黄文弼传略	黄 烈	(325)
附 专著目录		(336)
章培恒传略	骆玉明	(337)
附 主要著作与论文目录		(348)
戴裔煊自述		(350)
附 重要论著目录		(362)
魏兴南自传		(364)
附 文章专著简目		(367)

## 王运熙自传

我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出生于上海市西南金山县的扶王埭。金山县当时属于江苏省（解放后划为上海市郊县），南面就是杭州湾。我家靠近金山卫，离杭州湾只有几里路，平时能听到海水涨潮时的打击声。我幼时常跟大人到海滨去玩，在沙滩上拾贝壳。

我父亲王杰士，在大学读政法，但爱好文史，毕业后长期在中学做语文、史地教员。他喜欢写旧体诗，关心乡邦文献，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经编辑了《金山县鉴》三册，由友人资助印刷出版。我五六岁时，他即教我念一些唐人绝句，引起我对古诗的爱好。我在九岁时初小毕业，父亲叫我留在家里在他指导下学习，以读古书为重点。这样一直到十五岁进高中前后五六年时间里，我先后读了《四书》、《诗经》、《楚辞》、《尚书》、《左传句解》、《史记精华录》、《古文观止》、《六朝文絮》、《古文辞类纂》等文史古籍。父亲讲得很少，主要让我自己诵读，每篇诵读数十遍，达到能背诵或接近背诵的程度。这样学习，开头时囫圇吞枣，不懂地方很多，感到枯燥；往后理解能力逐步提高，大体能懂，就深感兴趣了。父亲还要我每周写一次文言文。我写得很认真，每次总要化上半天时间。这种传统的学习方式，虽然不免陈旧，但通过多读多写，使我培养了古代汉语的读写能力，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对以后研究古典文学很有好处。在这时期中，除精

读上述书籍外 还注意多读点历史。通读了《纲鉴易知录》。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出了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有数十种，我除读了文学方面的散文史、韵文史、俗文学史等外，还饶有兴味地浏览了经学史、理学史、目录学史、民族史、疆域沿革史等等，这对于掌握各方面的文化学术知识，起了不小作用。我以后研究文学史，注意联系历史背景来研讨，也与这种学习很有关系。此外，还用了少量时间学了点数学和英语。

在这段时间内，抗日战争爆发了。一九三七年冬，日寇在我家乡附近的金山卫登陆，我家仓皇逃难。日寇登陆后烧杀很厉害，我家房屋也被焚毁。父亲原有不少藏书，也全付劫灰。不久，我们搬家到上海，一家七口寓居在一间二十平方的房间内，非常拥挤。父亲继续在中学教书，当时物价飞涨，生活相当困难，但我学习未尝稍辍。

一九四一年，我进入住家附近的私立青年中学高中部学习。学习期间，除完成功课外，业余浏览了若干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的译本，最喜欢读的是鲁迅、茅盾、叶圣陶、莫泊桑、柴霍甫的小说。还看了一些文学史一类书籍，读了郑振铎编的《文学大纲》（实际是一部世界文学史），眼界扩大了不少。

我在高中只学了两年（当时学制为三年），于一九四三年考入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中文系学习。抗战期间，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北碚，留在上海的部分原复旦教师组成了这个补习部，教师和学生都比较少，中文系主任由社会系主任应成一先生兼任。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次年，重庆的复旦搬回上海江湾，与补习部合并，所以一九四七年我毕业时，已是国立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了。在大学学习前期，由于补习部教师少，没有机会听到著名文史学者的课。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听到了顾颉刚、

赵景深、蒋天枢诸先生的专题研究课，已经临近毕业了。

由于过去在家中读了若干古书，我在大学学习时感到比较轻松，大部分时间可用于阅读课外书。这段期间，我读了“五四”以来一些著名学者有关中国文史的专著和论文，主要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冯友兰、钱穆等人的论著，了解到“五四”后史学研究领域有信古、疑古、释古等不同派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它不但在政治社会史研究，而且在哲学、文学史研究中都表现出来。我一度饶有兴趣地读了顾颉刚先生主编的《古史辨》前面几册，还翻阅了《崔东壁遗书》；但后来更倾心于释古派的主张，感到它更为客观合理。这时还读了一些中外学者关于古代社会、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论著（包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也很受启发。我以后研究文学史，注意联系历史背景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解释，在方法上受到释古派的影响较多。复旦补习部图书馆的书很少，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又不好，因此要读到一些书也颇不容易。四十年代前期，修文堂旧书店搬到了我家所住的那幢房子里。我常常去该店看书，有时买几本便宜的。店主人孙实君先生很慷慨，我买不起的，常借给我看。记得我当时曾借了一套商务本的《王静安先生遗书》，看了好几个月。这时，我还读了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鲁迅全集》）和外国文学译本。还以少年时体验的家乡生活为基础，写了若干篇短篇小说，多数发表在上海《时代日报》的副刊上。后来自觉在创作上没有多大发展前途，就不再继续写了。

一九四七年夏我大学毕业，总成绩名列文科毕业生第一，被留任助教。有了工作和收入，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在短期内得以购置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魏两晋南北

朝诗》、《全唐诗》、《太平御览》等大部头的书，为开展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我的两个姊姊也都工作了，家庭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搬了一次家，寓所比从前扩大一些。我得到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做书房兼卧室，读书写作环境的确好得多了。

当时复旦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我做他的助手，常常到他家里去。陈先生学问渊博，又很健谈，每次到他家里，总是口若悬河，上下古今地纵谈各种文史知识。他勉励我立志做一个像样的学者，不要做一个仅会教一般课程的教师。他的谈话，使我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当时在读萧统《文选》，打算研究汉魏六朝文学。陈先生劝我认真读有关史书，并热情地把他的《八代的游戏文学》等论文给我看。我遵照他的意见，陆续读了《前后汉书》、《晋书》、《南史》等史书，读王闳运《八代诗选》，研究带有游戏性质的杂体诗。后来由于对包含有谐音双关语的风人诗发生兴趣，转而攻读《乐府诗集》，对六朝乐府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曲》、《西曲歌》进行系统的研究，写出《乐府前溪歌杂考》（《吴声西曲杂考》的一节）和《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两文，由陈先生介绍发表在《国文月刊》第七十五期、八十一期上。后一篇由于解释了清商曲辞的一些疑问，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大学毕业后的两三年内，自己在业务上获得明显的进步，除靠师友的教育帮助外，在学习方法上主要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仔细阅读原始材料，力图准确理解，并发现问题。象《乐府诗集》、《全汉魏两晋南北朝诗》两书的有关部分，都是一字一句反复研读领会的。有关史书也是认真阅读，做笔记。二、广泛地阅读并掌握有关资料。根据《四库提要》等目录书籍的介绍，尽可能多地阅读有关资料。我发现唐宋以来类

书的音乐部分，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关于乐府诗的资料，于是系统翻阅类书。复旦图书馆的书不够，就到藏古籍多的合众图书馆去看。馆长顾廷龙先生不怕麻烦地亲自一部部找出来让我在馆中翻阅，其热情令人感动。凡是古籍有注释的，我总是找最详的注释来参考，碰到有关问题，看它提供什么资料，然后跟踪追索。三、阅读前代、现代著名学者的札记、论文，从中获得启发。除掉过去读了王国维、鲁迅等人的著作外，这时候着重读了洪迈《容斋随笔》、杨慎《丹铅总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诗薮》、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和现代陈寅恪、余嘉锡、闻一多、朱自清诸家的论著，还有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在治学方法方面获益很多。这些学者都善于综合、考订史料，提出创见。其中赵翼的钩稽排比史料，说明某种历史现象；王国维、鲁迅的持论谨严，行文简练；陈寅恪的从寻常史实中发现并解释问题；闻一多的从多方面博采材料，论证问题，对我的启发尤大。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和大家一样，获得了学习马列主义的良好条件。五十年代，我陆续读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和文艺理论。虽然学得不好，但我深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它也是我们文史研究工作的指路明灯。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观上也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解释和评价的。当时教古典文学的老教师中刘大杰先生比较重视学习马列文艺理论，学得也较好。他讲文学史，重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分析作品，思想性艺术性并重，立论往往比较全面通达。我和他接触较多，在业务上也获得不少启发。

我于一九四七年留校任中文系助教，此后一直在复旦中文系工作。中间一九五二年夏到一九五四年夏两年时间内，一度借

调在复旦附近的华东工农速成实验中学教语文，组织关系仍在复旦。一九五二年升为讲师，一九六〇年升为副教授，一九七八年升为教授。三十多年中，教过“大一国文”、“文选及习作”等课，但主要是教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教学之外，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着重研究汉魏六朝唐代阶段。按照研究重点的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前期，约四五年时间，重点是研究乐府诗。我着重研究汉魏的相和歌辞和六朝的清商曲辞，它们在过去称为清乐，其中保存民间歌曲较多，文人作品也富有民歌风味，因此文学价值颇高。上文说过，我先是研究六朝的《吴声》、《西曲》，其歌词现存数百首，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不少贵族文人的作品。关于其曲调的本事和创作者，《宋书·乐志》、《晋书·乐志》等均有若干记载。因其内容多写男女情爱、歌词俚俗，赵宋以来，不受一般文人学者的重视。清代朱乾的《乐府正义》，注意考订汉乐府的历史背景，对《吴声》、《西曲》却仍然忽视。“五四”以后，它们受到重视，但往往被认作纯粹的民歌，与贵族文人没有联系，甚至认为《宋书·乐志》等关于某些曲调本事和创作者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见罗根泽先生《南朝乐府的故事与作者》，载《师大月刊》二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六月。）我从各方面搜集到不少资料，陆续写了《吴声西曲杂考》、《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等几篇论文，说明《吴声》、《西曲》的一部分曲调的确出自贵族文人之手，和他们的生活经历、情趣嗜好有密切关系；至于现存的一部分歌词内容和古籍中关于本事、创作者的记载不相吻合，那是因为它们只是后人利用曲调的声调（主要是和送声）写成的仿制品。这些论文，编为《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吴声》、《西曲》的研究基本上告一段落以后，就把研

究对象扩大到汉乐府，陆续写出了《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等论文。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对乐府诗进行分析评价，写了《汉代的俗乐与民歌》等论文。后来编为《乐府诗论丛》一书。当时，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论丛》（内有好几篇有关乐府的论文）出版，我同余先生不相识，读后写了几条小意见寄去，附上《说黄门鼓吹乐》的稿子。余先生复信欣然同意我的意见，并把《说黄门鼓吹乐》一文介绍到当时创刊不久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发表。稍后，我又把《六朝乐府与民歌》稿寄给余先生；他看过后作了很高评价，并为介绍出版。从余先生身上，我深深体会到前辈学者虚怀若谷、奖掖后进的优良风格。

五十年代中后期，乐府诗研究告一段落，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唐代文学方面。对唐诗，打算按照时间顺序有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一下。当时刘大杰先生因病休养，我接替他教“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唐代”一段，备课较忙，精力又不好，所以进度较慢。这时对初盛唐的某几个诗人作了研究，写了关于陈子昂、高适、王维、李白诗歌的几篇论文。同时，对韩愈散文和唐传奇也作了一点探索。除对单个作家作品进行论述外，还作了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如盛唐诗歌的艺术特征、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等。对唐代中期诗歌刚开始进行一点探索，频繁的政治运动就把原来的设想冲断了。有几篇论文还只写出初稿，到“四人帮”垮台后才写成。这些论文，都收集在《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一书里。五十年代末期，高等学校大搞群众性科研活动。当时复旦中文系师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项目（后一项写成而没有出版），我也参加了。这两部书，企图用两种思想倾向进行概括，不少地方生搬硬套，同时匆忙写出，对材料也缺乏钻研，因此写得不成

功。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们编一本《李白研究》，我感到这一选题范围较窄，容易掌握，就接受了。系里同意由一九五六年学生组织一个编写小组，由我负责进行编写。考虑到同学们原来对李白诗歌不熟悉，因此决定先花一段时间一起编一本《李白诗选》，让同学们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编写《李白研究》。两书出版后，由于观点比较鲜明，材料也较充实，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我原来对李白诗懂得也不多，通过这一阶段工作，稍为懂得多一些，但总觉匆忙编出，做得不够细致深入。

六十年代初，由于工作需要，我的研究重点又转移到中国古代文论方面。当时朱东润先生休假，我代他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课。周扬同志指定刘大杰先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文科教材，刘先生要我参加此项工作，与李庆甲同志一起编写先秦至唐代部分。我过去对批评史没有系统学过，这时只能凭藉文学史的一点底子，一边学一边干。当时我们编写小组在上海图书馆借到一个房间，借阅图书极为方便，为编写工作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可惜到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的锣鼓紧敲，大家到乡下去，工作就中断了，当时宋至清阶段只写出少数章节。经历了十年浩劫，一九七九年，刘大杰先生也病故了，我与顾易生、袁震宇、黄霖等同志把这项任务继续下去，到一九八三年全部完成。此书上中册已经出版，由于观点比较鲜明，条理清晰，材料方面也有发展（特别是戏曲小说理论介绍较多），受到读者欢迎。在编写批评史同时，还陆续写了若干关于古代文论的单篇论文，主要是探讨《文心雕龙》的。由于过去长期攻文学史，我在本阶段研究文学批评史时，在方法上比较注意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研究结合起来，即把古代文学创作现象和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还注意

把文论家的一般理论概括与他对作家作品的批评结合起来研究。我感到这样做，在分析问题的全面、正确、深入方面，会起良好的作用。我的《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韩愈散文的风格特征和他的文学好尚》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上面说过，我在大学学习时代即倾向于释古派。解放后经过学习，更注意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历史现象进行阐释。三十多年来，我从事科研工作，其基本倾向是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把所探究的文学现象和其他有关的历史现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求得到合理的解释。对古书的记载和古人的言论，不盲从，但也不轻率地加以否定。《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我服膺这两句话，把它们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但这只是主观愿望，并不能很好做到。

我从小体质虚弱，大学毕业后不久，即因眼力衰退晚上不能做文字工作。近年来年龄加大，体质更衰，视力愈差，连白天读写的时间也不多。长期来我比较注意安排好生活和工作，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活动，生活简单朴素，使精力能集中于工作；但终因能力和精力都差，成就不大。今后，仍将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园地里继续耕耘，作出新的成绩。

一九八四年一月

## 王运熙主要论著目录

### 一、专著

- 六朝乐府与民歌 1955年初版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乐府诗论丛 1958年初版 同上  
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 1981年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白研究 (主编) 1962年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学批评史 (主编) 上卷1964年初版, 中卷1981年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二、单篇论文

-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 《文汇报》1962年10月20日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 《文艺论丛》第4辑, 1978年出版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 (与杨明合作) 《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  
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精神 《文汇报》1962年1月27日  
《文心雕龙》的宗旨结构和基本思想 《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  
刘勰为什么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 《光明日报》1964年8月23日  
刘勰对汉魏六朝骈体文学的评价 《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  
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 《柳泉》1983年第1期  
《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 《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  
《文心雕龙·风骨》笺释 《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期  
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 《文史》第9辑  
刘勰的文学历史发展观 《文心雕龙学刊》第1辑  
《物色》在《文心雕龙》中的位置问题 《文史哲》1983年第2期  
《文心雕龙》评价作家作品的思想政治标准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刘勰论宋齐文风 《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

钟嵘《诗品》和时代风气 (与杨明合作)《文学评论丛刊》第9辑,  
1981年出版

肖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 《光明日报》1961年8月27日

《河岳英灵集》的编纂年代和选诗标准(与杨明合作)《唐代文学》1982  
年第1辑

杜甫的文学思想 《文汇报》1962年4月11日

唐代诗歌与小说的关系 《文学遗产》1983年第1期

略谈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 《光明日报》1965年8月15日

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 《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 1981年齐  
鲁书社出版

## 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好榜样王寅生

秦 柳 方

王寅生同志，江苏无锡人，一九〇二年生。中学时代，曾随兄在上海私立育才公学中学二年级就读一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于一九一九年夏，考入免收学杂膳宿费的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性情笃实，勤奋好学，各科成绩优异。一九二一年，师范毕业后，曾在无锡县立乙种实业学校执教一年。一九二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与尚钺同班同系。当时提倡学术自由、兼收并蓄的北大，对他来说，是学术思想活动的转折点，也是踏上正确道路的起点。

### (一)

他在北京大学，听当时历史系的年轻进步教授陈翰笙讲课，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的生动阐述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课外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够找得到的进步书刊。第二年起，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在课余担任家庭教师和其它能够挣点收入的工作，实行半工半读。一九二五年秋季起，曾在私立适存中学教高中史地课。一九二六年夏，经陈翰笙介绍，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苏联教师彼得·格尼维奇讲《文献通考》经济部分，大约一年光景，同彼得·格尼维奇的接触中，思想